

東亞「區域主義」的發展 與台灣的角色*

蕭全政**

摘 要

從歷史變遷的角度，本文旨在探討東亞地區三種不同區域主義的發展。任何區域主義基本上都隱含相關國家間特定的競爭與合作模式，因而亦隱含不同的利害得失關係。因此，這些國家間經常以區域主義為核心或方式，而展現各種聯合與衝突關係。

為提昇東協國家的政治自主性和促成經濟發展，「東協主義」孕育於東西對抗的冷戰時代，卻在強調合作與諮商的後冷戰時代才快速發展。相對地，以美國為主的先進國家卻強調全球化政經發展的「亞太主義」，以重整後冷戰時代的亞太政經秩序；而中共與日本在個別的戰略考量下，亦支持不同版本的「東亞主義」。

在這些區域主義的發展過程中，自冷戰時代即已展現強烈影響的區域內海陸爭霸格局，顯然仍在後冷戰時代發揮其關鍵性的作用。台灣的最佳策略，似乎仍須在東亞海陸爭霸的格局中，在安全上往美、日等海洋國家傾斜的同時，建構能兼顧或能平衡三種區域主義的科技產業分工關係。

關鍵字：區域主義、亞太經濟合作會議、東南亞國家協會、東協區域論壇、亞太主義、東亞主義、東協主義

* 本文初稿曾發表於二〇〇一年十一月三至四日，由中央研究院東南亞區域研究計畫（PROSEA）所主辦：「國科會東亞區域研究成果發表」研討會。南港：中研院社會研究所。筆者亦感謝國科會對本文所涉年度研究計畫的資助。

**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壹、導 論

隨著冷戰時代的終結，過去數十年來在全球層次強調意識形態差異的東西對抗，及因經濟發展程度不同而展現的南北對峙，都已於一九八〇年代末後逐漸消融於區域主義的政經潮流中。在冷戰時代深受東西對抗的制約與南北對峙影響的東亞地區，毫無例外地，亦因這種國際政經局勢的變遷，而呈現區域主義的蓬勃發展。

根據 Robert Gilpin 的說法，所謂區域主義 (regionalism)，乃是「在一定地理範圍內的一些國家，試圖透過經濟合作或聯盟，改善它們與已開發國家相對而言的地位」。其合作的形式主要有三種：第一，建立自由貿易區 (free trade area, FTA)，或關稅同盟 (customs union, CU)，以增加內部市場的規模，同時保護本國產品面對外部競爭；第二，實施投資規則和協議，以加強成員同已開發國家，特別是與其跨國公司討價還價的地位；第三，訂出區域產業政策，以便在各領域中把當地各自的公司合理組織和集中起來，成為該區域的佼佼者 (Gilpin, 1994: 330)。

依照 Gilpin 的這種說法，二次戰後以來的東亞地區，其實存在著各種類型和品牌的區域主義。從太平洋盆地經濟理事會 (the Pacific Basin Economic Council, PBEC)、太平洋經濟合作會議 (the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Council, PECC)、亞太經濟合作會議 (the 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Conference, APEC)、東亞經濟集團 (the East Asia Economic Group, EAEG)、東亞經濟會議 (the East Asian Economic Caucus, EAEC)，到東協自由貿易區 (the ASEAN Free Trade Area, AFTA) 等構想與實際組織性的發展看，東亞地區的區域主義，以地理範圍而言，可能包括涵蓋跨區域、區域性與次區域的各種不同品牌，而其合作的層次更可能包括民間或官方，或兩者兼具。其次，除上列如 Gilpin 所談涉及經濟合作者外，東南亞協會 (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 ASA)、馬菲印組織 (the Maphilindo)、東南亞國家協會 (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亞太安全合作理事會 (the Council for Security Cooperation in Asia Pacific, CSCAP)、東協區域論壇 (the ASEAN Regional Forum, ARF)、東南亞十國 (Southeast Asia 10, SEA10) 等構想與組織性的發展，亦表示東亞的區域主義，也可能是為文化交流、安全諮商或政治合作而發展。

從全球的角度看，一九五〇年代末期，因戰後經濟重建之故，許多地區開始嘗試建立各種跨國組織，以便在經濟上追求規模經濟或在區域間追求經濟資源的互通有無與相互協助 (周添城，1993：229)，乃興起第一波的區域主義。在冷戰體系的背景以及去殖民化 (de-colonization) 的迫切下，這些區域性的經貿組織若非是在美、蘇冷戰體系下所支撐的次級運作團體，如「歐洲共同市場」 (the European Community, EC) 以及「經濟互助理事會」 (the Council for Mutual Economic Assistance, CMEA)，就是南方國家希望藉由「南南合作」的方式來發展經濟，突破美、蘇兩極體系的制約，如「中美共同市場」 (the Central American Common Market, CACM) 及「安地斯集團」 (El Group Andes)。

因此，在冷戰體系下這些區域性的經貿組織，若非受到美、蘇超級強權的限制，就是因區域衝突與相互間的經濟競爭，而難以發揮適當的影響力及功用（蕭全政等，1994：29）。

一九八〇年代後期，第二波區域主義在不同的歷史環境下興起。隨著西德、日本及西歐主要工業國家，甚至亞洲四小龍（亦即南韓、台灣、香港與新加坡）的崛起，戰後的美國經濟霸權已不再獨霸於全球。在此全球經濟權力重構之際，結合同好以鞏固基地或爭霸世界，遂成為各國擴張經濟權力的必要措施。加上冷戰的結束，為避免任一國家填補強權留下的權力真空，東亞區域內國家勢必致力於強化彼此在權力及安全上的關係；而這種國家間（interstate）關係的轉換導致國際政經權力結構的改變，進而凸顯出區域性經濟組織在國際權力與利益競逐過程中的重要性。在此過程中，長期在國際體系扮演領導角色的美國，亦轉而積極地參與和倡導區域性經濟合作與安全諮商（蕭全政等，1994：32）。

進入一九九〇年代後，在第二波區域主義的潮流下，全球的權力及利益結構更隨著美、蘇兩極體系的瓦解、蘇聯解體、世界貿易組織（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成立，以及國際間日益瀰漫的新保護主義色彩，而展現不同於冷戰時期的戰略形勢。這其中尤以自冷戰後期國際間所形塑之三大區域經濟圈—歐洲聯盟（the European Union, EU）、北美自由貿易區（the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rea, NAFTA），及亞太經合會（APEC）所構成的戰略對應關係，將對未來的國際政經變遷扮演最關鍵的角色。

區域主義，顧名思義，其所涉及的政經利害得失關係必有內外之分；換言之，成員國家間基於共同利益而進行的區域內合作，本質上將因競爭或對立而不利於非成員國家。故每一種區域主義，無論是依地域或成員國身份為基礎，必然涉及成員與非成員間的利益競爭和衝突。其次，由於個別條件與特質的差異，區域主義所隱含的合作和競爭關係，也會在成員間或非成員間帶來不同的利害得失關係。因此，區域主義表示各國以特定區域作為其實現國家利益的場域，並因而進行各種聯合與衝突的權力攻防，以致於造成該區域特定政經事務的變遷；同時，這將不但直接影響區域內或成員國家的行為和決策，也將間接促成區域外國家或其他區域的政經發展方向。

另外，從功能性角度看，區域主義的內涵主要涉及經濟、政治和安全三個層面。對於個別國家而言，三個層面同時涉及其整體的生存和長期的發展，但是三者間的輕重緩急及其該以何種區域主義的方式或對象進行合作，卻深受國際政經環境及其自身政經特質的決定。

東亞區域主義的發展，顯然深受歷史性國際政經變遷的制約，而且展現第一波與第二波區域主義的特性。在冷戰時代的東西對抗與南北對峙的影響下，東亞的區域主義不是在反映美蘇超級強權的制約，就是無奈的展現南方國家的無力。但是隨著冷戰的終結及外來制約力量的鬆解，東亞各國擁有更大的自主性，以致於較有能力呼應或抗拒區域外先進國家的動員，或甚至能自主的推動較為有利的區域主義，無論是涉及政治的、經濟的或安全的。

本文主旨在於分析東亞區域主義在國際政經變遷中的發展，並論台灣的因應之道。然而，為了避免像過去的研究都將重點集中於各功能性組織或論壇以致於出現零細化的

缺點，本文嘗試從整合性的角度，依亞太主義(Asia-Pacificism)、東亞主義(East-Asianism)和東協主義(Aseanism)等三種區域主義，而分析各國或區域之所以採取相應作法的因果過程。

東亞地區，做為一個整體，有其特定的歷史、政經和社文上的特色。冷戰時代，在特定國際政經變遷下，東亞地區有其特定的政經發展和特定的區域主義；同樣地，在後冷戰時代，東亞地區也有其相應的政經變遷和區域主義的發展。本文第二節將分析冷戰時代東亞地區的政經變遷和其區域主義的特性，而第三節則論述這些變遷與特性在後冷戰時代的變化。最後，本文第四節亦將稍論台灣的因應之道。

貳、東西對抗與南北對峙中的東亞

雖然東亞各國具有歷史、文化、政治、經濟、社會、種族、宗教等方面的多元差異，而且相互之間，也經常存在著有關疆界、島嶼主權上的爭議，甚至宗教、種族上的衝突，及政治與歷史上的仇恨，但是在冷戰時代的東西對抗與南北對峙中，東亞各國相互之間的關係，基本上仍深受國際上一分為二的對抗與對峙潮流的切割。其中，依海陸爭霸格局而展現的圍堵(containment)形勢，仍根本的界定了各國相互間的關係；而不結盟運動所引發的南北對峙，亦次要地影響相關國家間的關係。因此，東亞區域主義的發展與特色，深受東西對抗的制約與南北對峙的影響。

一、冷戰時代的東亞

自一九四五年雅爾達會議之後，戰後的世界局勢即逐漸形成以美蘇為首的東西兩元對抗；其間，東西兩陣營不僅強調意識形態上的抗衡和政治與軍事武力上的對峙，也分別運用各種軍經援助、經濟合作，甚至是金融、貿易體制的建立，而形成「市場經濟」與「計畫經濟」或「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之間的對立。在美、蘇為爭奪世界霸權而主導與動員下，戰後兩元對立的冷戰結構，顯然不僅是軍事性的，也是經濟性的；而且不單涉及兩強的世界性對抗，其影響力也貫穿全球各區域或各國，而影響各區域或各國間的政經結構與動態。

在杜魯門主義(the Truman Doctrine)影響下，美國不但推動幫助西歐復興的馬歇爾計畫(the Marshall Plan)，也以軍事結盟聯合非共國家對共產世界採取圍堵政策。一九四七年，美國與中南美洲二十一個國家簽訂「美洲共同防禦條約」；一九四九年，與西歐十一個國家成立「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一九五四年，在亞洲成立「東南亞公約組織」；另外，也與亞洲其他國家，包括中華民國，簽署雙邊共同防禦條約。另一方面，在經濟上，美國除於一九四四年推動「布列敦森林協定(the Bretton Woods Agreement)」的簽署，成立國際貨幣基金會和世界銀行外，又於一九四七年與二十三國簽訂「關稅暨貿易總協定(the 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確立戰後的自由貿易與金融體制。此外，配合軍事圍堵策略，美國對於戰略地位重要的國家，又分別給予軍經援助，甚至

推動成立區域經濟合作組織，以強化各國的經濟發展和防衛力量。

面對西方陣營的挑戰，蘇聯於一九四五年拒絕「布列敦森林協定」的適用，並與東歐共產國家分別簽訂雙邊貿易協定；一九四九年，更與東歐五國成立「經濟互助理事會」；一九五五年，又與東歐八國成立「華沙公約組織（the Warsaw Pact）」。此外，蘇聯亦與中共聯手，不斷對外「輸出革命」，以擴大共產集團的勢力。

自十九世紀下半葉以來，列強在爭霸世界過程中曾提倡各種地緣政治性的戰略；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 Alfred T. Mahan 所提倡的「海權論（sea power）」和 Sir Halford J. Mackinder 所提倡的「心臟地帶論（heartland）」。海權論強調稱霸海洋者必能稱霸世界，而曾影響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美國對於加勒比海和太平洋的擴張；另一方面，心臟地帶論堅稱控制歐亞大陸（Eurasia）者可以稱霸世界，而曾影響希特勒的德國和蘇聯紅軍的戰略（許介麟，1991：3-12）。二次大戰後，美蘇兩強的世界爭霸，事實上亦正分別以海權論和心臟地帶論而展開。

從地緣位置上看，東亞地區正緊鄰歐亞大陸，而且面對太平洋和印度洋，正是大陸勢力與海洋勢力擴張的前哨或交鋒之地。東亞各國又大部分是戰後才獨立，或仍陷於落後與戰爭破壞的弱國；故當冷戰時代的東西對抗，基本上美蘇所代表的海洋勢力與大陸勢力依地緣特性而展開時，東亞各國不是成為海洋勢力的前哨就是大陸勢力的尖兵，有些國家，如越南與朝鮮，甚至因而一分為二，而分別扮演前哨與尖兵角色。

除了東西對抗的兩元對立之外，一九五五年萬隆會議所代表的不結盟運動，及因而引申的南北對峙局勢，對於東亞地區的政經發展亦具有相當程度的影響。在東亞諸國中，中共因想藉領導南方國家而與美蘇爭霸，故積極支持南北間的對峙；其他在獨立過程中，曾以民族主義反抗西方殖民母國的印尼、越南、緬甸，以及深具種族主義與回教傳統的馬來西亞，亦同樣支持南北對峙。尤其一九六八年，英國宣佈將放棄遠東防務，一九六九年尼克森發表「關島主義」（the Guam Doctrine）之後，部分東亞國家（特別是東協國家）更是發現必須尋求自立更生，不能仰賴美國的保護；此亦反映代表南方國家或不結盟國家運動者觀點的強化。

在冷戰時代，從經濟層面看，東亞地區依各國工業化程度的不同，可分為三種不同類型的工業化國家：一為以日本為首的先進工業化國家；二是在一九六 至七 年代興起之新興工業化國家，一般指的是亞洲「四小龍」，即台灣、香港、新加坡，及南韓；再則為後進工業化國家，以中國大陸、東協各國及中南半島國家為主。上述三類國家彼此間的貿易互動關係及以此構成的區域產業分工結構模式，仍是隨著時間過程中相互的變化以及整體大環境變動而有所不同。大致而言，東亞地區產經結構的發展歷程，可以分為三個主要階段：

自一九五 年代至一九六 年代末，是典型的先進工業化國家帶領後進國發展經濟的垂直分工模式。這一時期主要特徵是美國與日本以先進工業化國家之勢，在市場、資金、技術上都具絕對競爭優勢，故扮演著市場、技術與資金的主要提供者，同時也出口技術密集和資本密集產品至東亞各國。其次，南韓、台灣、香港及新加坡等亞洲新興工業化國家（NICs），則扮演引進美、日資本、技術及提供廉價勞力，生產勞力密集型

產品出口的特色。至於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及印尼等東協國家則扮演提供原料和初級產品的角色。此時期整體東亞地區的產業發展，是層次分明的垂直分工形態。

概從一九七〇年代初期至一九八〇年代中期，這一階段東亞產經結構基本上仍延續垂直分工的關係。不過，積極推動出口導向政策的新興工業化國家卻已逐漸興起，尤其兩次石油危機促成先進國家的產業調整，並對新興工業化國家產生經濟波及效應，而使原有先進國 NICs 後進國三個分工層次中的前兩個層次出現部分水平分工關係。亞洲 NICs 的興起，主要是抓住先進國向外轉移成本過高及勞力密集型產業的契機，大力推動出口導向的貿易發展策略，而得以高速增長經濟發展；其中，NICs 從日本大量進口中間產品和零組件，加工組裝後向美國市場出口，而 NICs 自美國得來的貿易順差，相當部分又以對日逆差方式回流日本。

概自一九八〇年代中期至一九九〇年代，東亞各國的產業間水平分工關係持續擴增，三級分工模式逐漸出現垂直、水平兼具的複合式分工關係，尤其是，隨著一九八〇年代東協國家經濟的快速成長，以及中國大陸在一九九二年實施二次經濟改革後的經濟成長率突增，東亞各國之產業分工關係逐漸形成以美國、日本、亞洲 NICs、東協與中國大陸之間的菱形分工模式。在此階段中促成東亞產經關係發生結構性變化的主要原因是，NICs 在一九八〇年代中期後利用日圓大幅升值之便，大力拓展對美出口，而形成龐大的對美貿易順差，進而在美國壓力下相繼調升幣值，迫使其在國內勞力、土地等生產成本不斷上漲的壓力下，不得不將部分勞力密集型產業向更為後進的國家轉移；另一方面，東協各國及中國大陸則利用 NICs 幣值大幅升值的機會，挾其豐富資源與廉價勞力優勢，積極發展勞力密集及加工出口產業，進而取代部分原來 NICs 產品的國際市場（李文志，1997：95-98）。當然，NICs 也因幣值升值效應而成為東亞地區新的資金和技術的提供者，並努力向美、日等國購併相關的產業技術，企圖拉開與東亞其他開發中國家的差距。

二、殘缺的區域主義

除了一九五四年成立的「東南亞公約組織」外，冷戰時代在東亞地區先後出現而具有「區域主義」色調的國際性組織，主要還包括一九六一年成立的東南亞協會（ASA），一九六三年的馬菲印組織，一九六六年的亞洲開發銀行（the Asian Development Bank, ADB）、一九六七年的東南亞國家協會（ASEAN）和太平洋盆地經濟理事會（PBEC）、一九八〇年的太平洋經濟合作會議（PECC）及一九八九年的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

這些組織大致上可以分成三類：第一類是反映東西冷戰格局下，外來西方勢力所主導而成立的組織，包括東南亞公約組織和亞洲開發銀行；第二類是反映區域內成員國充分自主性而成立的組織，包括東南亞協會和馬菲印組織；而第三類則是區域內成員國主動提議卻還經外來西方國家支持或參與的組織，包括東南亞國家協會、PBEC、PECC 及 APEC 等。

在第一類組織中，東南亞公約組織是依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模式而成立，而亞洲開發銀行，亦是仿世界銀行的模式而設置。兩個組織的區域內參與成員，亦都以親西方的國家為限；而作為反映全球性東西對抗的一環，這兩個組織也都同時包括部分西歐國家。

特別值得一提的，在反映西方開發主義的同時，亞洲開發銀行的資金與依認股多寡而定的決策權，仍大部分是由西方國家控制。

在第二類組織中，東南亞協會是由菲、泰、馬等三國組成，強調以經濟、文化、社會、科學、教育和行政上的合作為目的，而且標榜亞洲問題應由亞洲人決定。另外，馬菲印組織由馬、菲和印尼組成；其目的在協助解決馬來西亞聯邦成立時的歧見與領土糾紛。

然而，由於區域內大國印尼一開始即指責東南亞協會是親美、反共組織，而且一九六三年後，馬、菲又為北婆羅洲主權起爭執，致使該協會名存實亡。其次，馬菲印組織隱含「大馬來聯邦」的種族中心主義；區域內其他各國本來即持保留態度，馬來西亞聯邦成立後，印尼更採對抗態度，以至於該組織亦徒具形式（陳治萍，1993：32）。

在第三類組織中，東南亞國家協會基本上是承襲東南亞協會和馬菲印組織的精神、合作內容和組織形式等發展而成；然而，其所以能超越前二組織的癱瘓狀況，實源於區域內東西陣營間的變化。一九六五年，美國正式參與越戰；另一方面，同樣在一九六五年，印尼親共的蘇卡諾政權在一場流產政變中下台，上台的蘇哈托轉而親美，而且採取睦鄰政策，並強調東南亞一體化的重要；而在該年十一月贏得菲律賓大選的馬可仕總統，亦宣佈減緩對於沙巴主權的要求。在美國的協助下，東南亞五國於一九六七年成立東南亞國家協會，以加強區域內經濟、文化和社會方面合作；其實在各國身受國內共黨叛變之苦，而且中南半島因越戰擴大而更加不安下，東南亞國家協會的成立，顯然亦兼具政治與安全的考慮（陳治萍，1993：33-40）。其中，中共與蘇聯都批評東南亞國家協會是圍堵陣營中反共產主義的一環。

一九六九年，尼克森提出「越戰越南化」的主張，並陸續強調「以談判代替對抗」的低邊政策。加上英國於一九七一年後放棄遠東防務，東協國家為了自保而於一九七一年十一月發表「中立化宣言」（the ZOPFAN Declaration）。一九七五年中南半島三國相繼淪陷；一九七六年，東協第一屆高峰會簽署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the Treaty of Amity and Cooperation in South East Asia）和東協和諧宣言（the Declaration of ASEAN Concord），希望將中立化轉成更為積極的區域合作，包括具體的物資之合作生產與緊急支援、大型工業計畫之合作、經貿上優惠，與麻醉藥品管制等。一九七七年，東協調整其組織，將原來最高層級的部長會議改為東協政府領袖會議。隨著經濟的起飛和擴張，自一九八年代初以後，東協各國即以東南亞國家協會為中心且以相當齊一的步伐面對亞太各國，而展現其東協主義，雖然對內的各類合作成效似乎較為有限（陳治萍，1993：58-67）。

一九七十年代中期至八十年代中期，可以說是東協區域經濟合作的奠基階段。東協各國在國內政治情勢逐漸穩定之後，開始全力追求經濟發展。然而，此時正是東協國家積極拓展對外貿易之際，兩次石油危機及全球經濟不景氣，對東協國家造成重大打擊。因此，東協自一九七六年的峇里島高峰會後，陸續推動各項區域經濟合作計劃，並與貿易夥伴舉行擴大外長會議，而想藉由集體的力量的共同面對歐美的新貿易保護主義，以帶動各國經濟的發展。在日本所構築的亞太地區「雁飛型」發展模式下，東協國家推展內部合作，確有吸引外資、提升東協國家在亞太分工體系中之地位的目的。

另外，在第三類組織中的 PBEC、PECC 與 APEC，從倡議成立之初即涉及東亞本地政經勢力和外來政經勢力之間的爭鬥。在一九五七年西歐簽署羅馬條約而成立歐洲經濟共同體後，日本首先倡議在東亞設立類似合作組織；但是東西對抗中的美國全球主義和東協各國對外來政經強權的疑慮，卻使日本的構想難以實現。在各方的折衷、妥協下，PBEC 於一九六七年成立，由民間企業領袖推動，負責商討、研究有關區域性經貿、技術合作事宜，並以促成經濟發展為宗旨。另一方面，一九七〇年代的兩次石油危機和西方的新保護主義都明顯改變全球經濟生態，致使區域內各國都有強化經濟合作的要求；在日本和澳洲的積極推動下，PECC 以「產官學」三位一體的方式於一九八〇年成立，而提高 PBEC 設立以來的合作方式。至一九八〇年代末，東西對抗的結束和烏拉圭回合多邊貿易談判的失敗，都直接導致 APEC 的形成；至此，全球逐漸隱然形成後來以北美自由貿易區、歐洲聯盟和 APEC 三個組織體系為核心的三元對立，而影響後冷戰時代的政經變遷。

參、後冷戰時代的東亞與東亞區域主義

一九八九年以後，隨著美蘇之間及東西對抗陣營之間的和解，過去依賴意識形態差異與經濟發展程度不同，而展現的全球性東西對抗與南北對峙格局，已逐漸因各國的重視經濟合作與安全諮商，而慢慢被強調地緣政治與地緣經濟因素的區域主義所取代。歐洲聯盟、北美自由貿易區和 APEC，正是代表其中最重要的三大經濟區塊。

隨著東西對抗的瓦解和南北對峙的鬆緩，東亞各國同時解除外來兩元化對抗勢力的制約，而增加其自主性，但也面對新行政經勢力與潮流的壓力和挑戰。一時之間，各國的國家主義及各國相互之間因不同的聯合與衝突而展現的次區域主義、區域主義與全球主義等，顯然為後冷戰時代的東亞地區，帶來喧囂、複雜，卻也隱含希望的空前畫面。以本文主題所涉及者而言，東協主義、東亞主義與亞太主義，及三者之間的聯合與衝突，更是影響亞太地區政經發展的關鍵因素。

一、三元區域鼎立下的東亞

一九七〇年代是冷戰時代國際政經體制和權力結構開始出現大轉型的關鍵年代。一九七一年八月十五日，為改善美國國際收支並打擊美元投機者，尼克森總統宣佈取消美元與黃金間的可兌換性，因而瓦解布列敦森林體系以美元為中心的固定匯率制。自此，美元做為國際外匯準備的唯一性被打破，浮動匯率與區域貨幣因而相繼出現；而美國維持其全球軍事霸權的基礎更不僅因而動搖，而且進一步強化全球政治與經濟議題和勢力的區域化。

其次，一九七〇年代爆發的兩次石油危機，引發全球性之經濟大風暴，不只已開發國家受到嚴重之影響，發展中國家受到的打擊尤大，導致其間貧富差距更加懸殊；一九七四年，以「七七集團」為主體的發展中國家因而促成聯合國通過「新國際經濟秩序」（the New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NIEO）宣言。這些重大事件的衝擊，不僅牽制，

更改變美蘇對全球政、經事務的處理能力與方式。美國全球經濟霸權的時代，特別是在尼克森總統中斷美元與黃金的兌換關係後，亦已正式結束，連帶地以往依美國全球利益而設計的全球經貿、貨幣體制，自然的也受到質疑。於是繼歐市匯率如何區域化的問題後，歐市國家與第三世界國家更依據「雙邊協定」的方式，在一九七五年簽訂「洛梅協定」，由歐市國家提供南方國家「普遍化優惠關稅」(the Generalized System of Preferences, GSP) 待遇。影響所及，美國也以 GSP 作為其與受惠國雙邊貿易的籌碼。自此，全球貿易已邁入雙邊與多邊及區域與全球之「雙趨性」同時發展、抗衡的時代。一九七〇年代中期，美國新上任的卡特(J. Carter)總統也將美國的軍事戰略佈局，逐步由全球性的「世界主義」往區域性的「區域主義」修改；這不僅愈形降低美國的全球性政軍影響力，相對也促使蘇聯擴大對區域性事務的介入，而埋下日後蘇聯因軍備擴張過於急速所造成的經濟失調，進而迫使蘇聯集團瓦解(李文志, 1997: 18-19)。

進入一九八〇年代，美國總統雷根(R. Reagan)為平衡蘇聯於七〇年代在軍備與區域性事務的擴張，以及穩住美元持續下跌和刺激美國經濟景氣，一面提出 SDI (Strategic Defence Initiative)，從事軍備競賽，另一方面則採「供給面經濟學」，期望能藉由大幅減稅 刺激消費 提升經濟景氣 增加稅收 穩住美元 彌補軍備擴張經費的政策邏輯，來改善美國的軍經困境。然而，在高利率、高美元與企業競爭力不足的情況下，反造成美國「雙赤字」更加惡化，並於一九八五年從全球最大債權國變為最大債務國，繼而迫使「G5」財長會議在該年秋天簽訂「廣場協定」(the Plaza Agreement)，促成美元相對於其他貨幣大幅貶值，尤其以對日圓貶值最多。這除造成日圓的鉅幅揚升及其對亞洲新興工業化國家的經濟產生「波及效應」，而使亞太地區的經濟力在八〇年代後期迅速竄起外(李文志、蕭全政, 1991: 123-124)，也更強化歐市的整合腳步。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美、蘇舉行「馬爾他高峰會議」，宣稱美蘇關係的全面和解，直接促成冷戰時代兩極對抗體系的瓦解。繼之，東歐國家為因應國際環境變遷與內部經濟改革需求而來的政經變動，更進一步於一九九〇年中期後徹底打破二次大戰以來的冷戰體系；東、西德亦於同年十月三日完成統一。而且，十一月十九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會員國與華沙公約組織的成員國，更在巴黎簽署「歐洲裁減常規軍備條約」和互不侵犯的聯合聲明，宣佈持續近五十年的東、西冷戰正式落幕。一九九一年十二月，蘇聯解體；東西對抗的兩元體制，更是一去不復回。

後冷戰時代，隨著全球經濟發展區域化，世界局勢逐漸轉為以歐洲聯盟(EU)、北美自由貿易區(NAFTA)以及亞太(APEC)等三大經濟區塊為重心。面對經濟與安全議題凌駕政治、軍事議題而為後冷戰時代的主流趨勢，各國無不藉由多邊或雙邊合作關係的建立，消弭關稅壁壘的貿易保護主義；而此種經貿合作關係足以影響全球，乃至區域、國家的政經發展。

自一九六五年合併歐洲煤鋼共同體、歐洲原子能共同體，及歐洲經濟共同體三組織後，歐市(EC)即深化其區域經濟的整合；此外，為走出一九七〇年代兩次石油危機以來停滯的經濟困境，歐市繼一九七九年成立「歐洲貨幣制度」(the European Monetary System, EMS)以「歐洲通貨單位」(the European Monetary Unit, EMU)作為記帳的基本

單位後，在一九八六年三月亦正式宣佈於一九九二年成立單一市場。一九九三年十一月，馬斯垂克條約生效後，歐洲聯盟（the European Union, UN）正式成立；一九九四年一月一日，歐洲經濟區域（the European Economic Area, EEA）開始運作（Portes & Vines, 1998: 73-101）。同年十二月，申根協定（the Schengen Agreement）通過，歐盟成員的國民得以在區域內自由流動；一九九五年十二月中旬，歐盟十五國確定歐洲單一貨幣名為歐元（Euro），而於一九九九年正式推出，並計畫於二〇〇二年開始進入流通領域。

相對地，美國因經濟力的衰退與一九八〇年代中期後國內貿易保護主義的壓力，故於一九八八年元月與加拿大簽署自由貿易區協定，並於一九八九年元月生效而與加拿大共組「美加自由貿易區」；一九九三年，擴及墨西哥後正式成為北美自由貿易區。由於美國與加拿大擁有龐大的資金與技術，在結合墨西哥的廉價勞工與廣大的市場後，多年來已為此區域帶來龐大的經濟利益。

自一九六〇年日本的鹿島森之助提出泛亞洲經濟合作組織的構想後，如何在亞太地區促成普遍的經濟合作，已深為太平洋盆地諸國所關切。一九八九年亞太經濟合作會議的成立，為區域內的經濟合作邁開一大步；而一九九一年漢城會議中，台灣、香港與中國大陸的加入，使亞太經濟合作會議的運作化略具雛形；一九九二年曼谷會議所通過的「一九九二制度安排」宣言，更讓 APEC 往組織建制化的方向邁進一大步。相較於歐洲聯盟與北美自由貿易區的發展，APEC 自一九八九年十一月成立以來，已帶動亞太國家的經貿合作與發展，而且經過不斷的折衝與協商，成員經濟體已從創立初的十二個，至一九九八年成為二十一個。

在區域性經濟合作與安全問題的解決成為國際政經關係與運作之主要內涵的後冷戰時代，亞太地區，尤其是東亞地區的經濟與安全合作事務，顯然仍有極大的發展空間。而東亞地區的戰略態勢，即在區域性經濟與安全兩大利益的聯合與衝突過程中，逐步展開於各國的權力攻防中，並具體反映於東亞各不同內涵的區域主義及其基本利害關係與戰略結構上。

首先，海洋與大陸霸權的辯證互動是影響東亞局勢發展的軸心。東亞地區由於特殊地緣特徵，即海洋與大陸的相對地理關係，以及自二次大戰後兩大地理區域分別採行不同政經體制與發展策略，導致東亞地區自韓戰以來，即隱然呈現海洋（以美、日為首的資本主義國家），與大陸（以蘇聯、中共為首的社會主義國家）兩大地理區域的戰略對峙關係，並具體展現於政治、軍事與經濟的對抗及衝突。這一海、陸霸權競逐的權力結構在後冷戰時代，因蘇聯解體及美、日等國與中共展開「和平演變」與「反和平演變」的戰略攻防，而再度彰顯。東亞各國對戰略利益的界定，也順著此一戰略軸線而進行，並依序編排於由地緣經濟與地緣政治兩大利益所交織成的軍經運作體系中。

其次，從涉及資金、技術和市場之汲取與安排所構成的地緣經濟內涵看，長期以來在東亞地區的經貿體系中，即以獨特之「雁飛型經濟發展模式」呈現，並與地緣政治中的政軍權力部署與安全結構的配置，具有內在利益的聯繫與衝突關係，即美、日等海洋國家優勢的經濟地位適與劣勢的中共等大陸國家，處於戰略性潛在衝突的對應關係。然而，在一九九〇年代初期後，美、日與中共等三大區域強權在亞太地區出現明顯的權力

消長，包括：泝美國因經濟力衰退，決定大幅減縮國防經費與海外駐軍，而柯林頓政府更堅持「自由公平」貿易原則，而採取保護主義者的強硬立場；泝日本深陷泡沫經濟破滅後內需蕭條與輸外資金緊縮困境下，卻積極整備及提升日本的國防武力與國際政治地位；泝中共自鄧小平南巡及十四大後進一步強化經濟的改革開放，儼然成為東亞地區經濟發展的新火車頭。東亞地區的政經局勢，過去由美、日所主導而以全球主義或亞太主義為內容的運作方向，已逐漸激發以東亞主義甚至是國家主義牽制或吸納全球主義與亞太主義的新趨勢。

此外，對東亞地區而言，一九八五年「G5」財長會議的召開及其所簽訂的「廣場協定」，直接影響東亞各國的經貿發展；此不僅改變東亞地區既有的經貿結構，也造成美國在東亞甚至亞太地區之經濟地位的削弱。「廣場協定」簽訂後，自一九八六年起，東南亞各國的外資主要來源已由美、歐等西方國家，逐漸轉變為日本及台灣等亞洲新興工業化國家。在東亞區域投資帶動貿易的效應下，東亞各國間相互投資的金額大幅增加，區域內的貿易量與貿易比例也因而上揚；隨之，東亞地區占全球貿易的數額比例也迅速攀升。從經濟權力結構的變遷觀之，「廣場協定」的意義，即在於提升東亞區域經濟利益的自主性。對於冷戰時代主導東亞地區經濟發展的美國而言，一九八〇年代後期東亞經貿發展的趨勢，明顯不利於其企圖在後冷戰時代持續保有主導東亞經濟發展的地位。

進入一九九〇年代中期以後，亞太地區產業分工的深度及廣度更加擴大，並主要表現在兩方面。首先是，區域內貿易比重的擴增。傳統的「太平洋貿易三角」，即以美國的廣大市場吸納日本、NICs，及東協等地出口產品的產經模式，雖在一九八〇年代中期至九〇年代初期因美國經濟下滑而面臨結構性的調整，但從柯林頓政府上台大力提振美國經濟後，自一九九〇年代中期起日見復甦的美國經濟又成為東亞經濟發展的重要「雁頭」。這使得過去以美國為首的區域性經濟成長動力，在歷經東亞金融危機後又再度被強化。不過，在同一時期東亞地區的經濟規模也不斷擴大，尤其是伴隨所得增加而出現的消費擴張，及各地區大型公共基礎建設的推動，使得日本、NICs、東協及中國大陸相互間貿易比重增加；這些東亞國家間的貿易比重，即由一九八〇年的百分之三十三點四四增至一九九二年的百分之四十三點二七及一九九七年的百分之四十八點七五。

其次，亞太地區的三級垂直分工關係也因許多產業間日趨水平的分工關係，而使垂直與水平分工並存的複合式分工模式日漸擴大，如台灣與南韓最重要的科技產業——半導體產業（包括 IC 設計、晶圓代工與 DRAM 等產業）即幾與美、日的電子產業同步發展，並整合成全球性的分工體系；同時，台灣較低階的電子產業及重要的傳統勞力密集產業（包括台灣非常重要之石化產業中的部分上游和中、下游廠商），也已大量外移中國大陸與東協國家，而與這些地區的相關產業逐漸發展出新的水平分工關係。隨著廠商海外投資日益擴張及跨國性區域企業的日漸增多，東亞各國的產業結構就在投資母國與地主國間投資性貿易大幅增加的情況下，不斷調整或拉近彼此的產業分工關係，形成東亞地區獨特且多層次的國際分工體系。

另外，美國從一九九五年起強勁復甦的經濟使其仍為推動東亞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持續的經濟成長讓美國成為吸納東亞各國產品的主要市場，此一情況在東亞金融危

機後更加顯著；此外，強勢的美元、充裕的資金及全球化的金融佈局，特別是一九九年代以來迅速擴增並游走於全球的共同（投資）基金，以及假 WTO 所通過之「全球金融服務業自由化協議」和東亞金融危機的善後機制，都再度讓美國成為東亞金融危機後挹注東亞資金（包括透過 IMF 機制援助東亞的資金）的重要源頭。歷經金融危機衝擊的東亞地區，又在美、日與中共新一波的攻防後，在產經關係上，展現比以往更為複雜的運作結構。

一九九一年十一月，當冷戰終結而且準備從菲律賓撤軍時，美國前國務卿貝克（James Baker），曾提出「扇形」（fan-spread）戰略模型，解釋後冷戰時代美國的亞太政策（Baker, 1991）。在貝克的理論中，政治民主化、經濟自由化，和由美國及其盟邦所締結雙邊軍事條約為基礎的安全體系，將是美國亞太政策的三根骨幹。政治民主化涉及人權的保障和公民權的體現，必然將促使威權或極權政體的解構或轉型；而經濟自由化涉及經濟的市場化和政府角色的淡化，正如 APEC 所主張者一樣。在「扇形」安全體系中，美國強調以其分別與日本、南韓、菲律賓、泰國和澳洲間的雙邊軍事盟約各為「一根扇骨」，而美國則控制「扇底」以至於構成「扇形」安全防衛體系的佈署。

當「扇形」安全防衛體系的佈署看來像是針對中共的另一種圍堵，加上政治民主化和經濟自由化，海洋強權顯然有其完整的和平演變藍圖和行動。柯林頓總統的「新太平洋共同體」構想與政策，顯然更強化這種三位一體的「扇形」戰略（李文志，1997）。當然，這種圍堵的特性與冷戰時代不同，只在防止對區域安全或穩定之威脅的擴大，故有人稱為「軟圍堵」，有人稱為「建設性接觸」（constructive engagement）。另一方面，海洋強權對於政治民主化和經濟自由化的強調，亦對所有東協國家產生壓力，儘管她們較能接受「扇形」安全防衛體系的佈署。

面對以美國為首的海洋世界的和平演變，中共很有技巧的提出以加強經濟改革和開放為主軸的反和平演變策略。在以提升綜合國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為中心的經濟發展目標下，中共一方面加強對外開放以吸納海洋世界所帶來的經濟資源和經濟機會，另一方面則加強內部改革以鞏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主體，以對抗和平演變的壓力（蕭全政，1993；李文志，1996b：100-117）；其中，意識形態與政治控制的加強、反資本主義精神污染和軍事現代化等，都是強化社會主義主體所不可或缺者。尤其一九九二年初，鄧小平南巡所觸動的第二波經濟改革，更是體現上述的總體戰略。在黨軍結合的路線下，鄧小平的富國強兵政策，將經濟發展與軍事現代化緊密連結（蕭全政，1995：52-53）。

鄧小平南巡之後，一九九二年二月，中共通過「領海及毗連區法」，將台灣、中沙群島、東沙群島，以及爭議中的西沙群島、南沙群島、釣魚台均列入中共的疆域範圍；此等於為中共海軍以武力排除外來威脅的權力賦予法律基礎（張雅君，1996：94-99）。中共亦積極加強海空軍為重點的軍事現代化設施，一九九二至一九九三年向俄羅斯採購二十六架具有強大攻擊性的蘇愷二十七型戰鬥機（SU-27/UBK）、877/636 型 K 級潛艦、一九九七年購入現代級導引飛彈驅逐艦，以及一九九九年購入蘇愷三十型戰鬥機（SU-30MK）等；此顯示中共軍方自一九八〇年代起不斷宣揚「重視海權，加強海軍建設」的思維，在一九九〇年代後終於成為中共領導階層的共識，並期待在二〇一〇年發

展完成遠洋艦隊，成為一個海洋國家。由此觀之，中共在一九九三年「十四大三中全會」召開前夕，國家計畫委員會所提出之「三個三角」戰略，無疑是其展現中共邁向海洋與部署亞太戰略的重大指標¹。從戰略的角度觀之，中共所提的「三個三角」戰略，不論就經濟發展策略或地緣政治而言，確實具有統合現階段軍經發展戰略的意義，並企圖透過大中小三個三角間的「遠交近攻」，達成其在東亞地區架構「多層次的統一戰線」的布局，而最終目標在於平衡美國在東亞地區獨大的權力結構（李文志，1997：251-252）。

從中共以「三個三角」戰略所鋪成「多層次統一戰線」的形式來看，「第一層統一戰線」是為解決台灣與香港問題。對中共而言，其與台灣和香港的地位及關係，不僅涉及經濟發展的問題，也涉及中國民族統一大業的志向，更涉及其在廿一世紀變成海洋國家的理想。因此，中共積極推動「大中華經濟圈」與「華南經濟圈」，達成「以經促統」的政經目的，逐步強化對台灣的武力威嚇，以加速兩岸統一的步調。在一九九五年六月李登輝總統訪美後，中共一連串的軍事演習，更顯示其以武力鞏固「第一層統一戰線」的強硬立場。

另一方面，日本自韓戰以來，一直是美國在冷戰時期亞洲地區重要的盟邦；進入後冷戰時代，隨著美蘇軍力淡出東南亞與中共共一大陸國家的興起，日本必須在亞太海陸局勢的變遷中，採取更為平衡的軍經發展策略。首先，日本藉著成為美國在東亞地區首要安全支柱而大幅提升國防武力的同時，也設法改善與東亞各海洋國家的關係，特別是積極介入東南亞區域事務；其次，日本亦積極尋求與中共改善關係，試圖從美國與中共勢力消長的過程中，逐步實現其作為一個自主國家與區域強權的立場。尤其在區域經濟集團化的趨勢下，日本更亟欲擺脫「經濟巨人、政治侏儒」的格局，從經濟大國拓展為政治大國，進一步力求成為亞洲地區的領導人。

一九八五年以來，因日圓大幅升值而帶來的產業結構調整，日本在東亞地區逐漸取代美國而為本區資金與技術的提供者；而區域經濟日盛與貿易保護主義增強，更鞏固日本在東亞地區的經濟領導角色。一九八九年八月海部俊樹接掌內閣後，即趁冷戰結束與波斯灣戰爭的機會，積極部署提升日本國際地位，包括提議以美日歐三極作為建構未來世界秩序的基礎、強調日本應在國際社會扮演與自身經濟實力相稱的角色，以國際性合作與政府的開發援助促進和平，及企圖透過建立與美國的「全球夥伴關係」（global partnership），逐步形塑日本身為全球性集體領導者的地位（Brown, 1993; 1994）。

另外，對東協各國而言，一九七〇年代以來引進外資帶動的經濟成長，已使東協國家成為全球經濟成長極為顯著的地區。然而，隨著後冷戰時代來臨，全球區域化程度加深、美國新保護主義興盛、日本泡沫經濟破滅，以及中國大陸經濟開放的競爭壓力，各

¹ 所謂「三個三角」是指中共將由大、中、小三個不同層次的「三角關係」，架構與實現其九〇年代的國際發展戰略。其中，「大三角」是指經營中共、美國與日本的關係；「中三角」則為拉攏中共、亞洲 NICs 與東南亞的關係；「小三角」是中共、香港與臺灣的統一大業。而中共的近程戰略就是掌握「小三角」，爭取「中三角」，以便周旋「大三角」（中國時報，一九九三年十一月十五日；版九）。

國對東協國家的投資減少；加上其投資環境不能配合改善而逐漸惡化，如基礎建設落後、勞動成本上升、勞工教育水準無法提升、投資手續繁瑣，以及產業升級未如理想以致於競爭力有限等諸多限制，東協國家的經濟發展終陷入瓶頸。東協國家為突破困境，乃起而對抗貿易保護主義，並努力改善投資環境、擴大貿易市場、吸引外資、進行產業升級以提升經濟的競爭力。因此，東協企圖運用集體力量強化對外談判的籌碼，並利用 EAEG 與 EAEC 之議題，作為對抗美歐經濟壁壘與強勢經濟干預主義的手段；對內則以東協為範圍，推動成立自由貿易區（AFTA），並透過「成長三角」與其他雙邊經濟合作計畫，加速區域與各國之經濟發展（陳治萍，1993：93）。至於政治層面，東協各國則積極提升東協在區域事務的主導地位，推動 ARF 作為處理東亞安全事務的機制，並具體落實「東南亞十國」（SEA10）的構想，希望將東南亞的所有國家皆納入東協體系，藉由東南亞一體化來增強東協在東亞地區的重要性（Dosch & Mols, 1998）。

二、亞太主義、東協主義與東亞主義之爭

反映著後冷戰時代政經勢力的流轉與變遷，東亞地區事實上存在著帶有區域色彩的三種主要區域主義。首先，以美國為首的先進工業化國家，希望配合以自由經濟為基底的全球主義，而在區域內推動亞太一體化的亞太主義，作為替代其在冷戰時代圍堵式的霸權結構。其次，全球主義或區域經濟合作潮流所隱含的更激烈競爭，和東西對抗鬆解後的區域強權爭霸，都使東協國家擔心更急迫的政經壓力，而全力發揚已有基礎的東協主義。另外，在分別聯結傳統上的大陸勢力與海洋勢力的同時，中共與日本亦分別強調不同內涵的東亞主義，以為其爭取區域霸權的依據。

因為政經利害關係上的差別，三種區域主義之間事實上亦存在著各種聯合與衝突關係。為推動亞太主義，美國須經常平衡中、日東亞主義間的槓桿，而且以妥協或聯合而化解來自東協主義者的壓力；東協主義者經常在經濟上聯合東亞主義對抗亞太主義，且在安全上以亞太主義平衡東亞主義，並突顯其主體性與自主性；相對而言，中共與日本分別利用與東協或亞太各國間之關係，而發展其自主性。三種區域主義及其間的聯合與衝突關係，經常表現於區域內的經濟或安全合作組織之成立或運作過程上。

當一九八八年元月和三月，美、加兩國和歐市各國分別宣布將成立美加自由貿易區和歐洲單一市場後，亞太各國亦加緊經濟合作組織的推動，而加速冷戰終結前後經濟區域化的進行。另一方面，鑑於烏拉圭回合貿易談判的膠著，一九八九年十一月，APEC 在日本與澳洲的積極推動下成立；美國亦積極利用 APEC，以發展能與其自由經濟理念相結合，甚至能藉以重整亞太政經秩序，或迫使歐洲國家接受烏拉圭回合談判中美方主張的經濟潮流。因此，特別是從一開始，APEC 就變成亞太主義、東協主義和東亞主義，甚至與歐洲主義間，一個爭鬥極為厲害的場域。

APEC 成立之初，宣稱是非正式、非官方、以共識決為基礎的經濟論壇，故成員身份是經濟體（economy）而非國家（nation），參與的外交、經貿部長都是以個人身份與會，以自願參與和共識決為原則，而其結論亦不具拘束性。這些內容與原則顯然都帶著東協主義的色調；然而，另一方面，APEC 所標榜的「開放性區域主義」（open regionalism），

卻在帶著東協主義色調的同時，也含有亞太主義的精神。

隨著一九九一年美國「扇形」戰略的宣布、九二年決定於新加坡設立秘書處、九三年柯林頓總統發表「新太平洋共同體」構想並主導 APEC 建制化（包括增設經濟領袖會議，且討論具體經合內容和時間表等）、九四年決議經濟自由化時間表、九五年提出行動綱領，及後來簽署資訊科技協定（ITA）等，亞太主義在 APEC 似有明顯的進展，而使 APEC 原來所標榜的非正式、非官方、共識決及不具拘束力的論壇等東協主義原則，不斷受到挑戰與調整。

在 APEC 亞太主義之擴張中，東協主義者不斷表現其對建制化、正式化的抗拒。其策略之一即一方面強化東協主義的發展而推動東協自由貿易區的設置，另一方面則提出 EAEG 與 EAEC 構想，以結合具東亞主義的國家。在此其中，東亞主義的力量從開始之初即屬較為微薄的，例如第一屆 APEC 會議正式名稱中的亞太（Asian Pacific），在第二屆年會之後即被改為 Asia-Pacific，而使亞太的含義從「亞洲的太平洋」變成「亞洲加太平洋」，雖然東亞主義者，如中共，其本身對亞太的含義仍是「亞洲的太平洋」。另外，基於地緣政治與地緣經濟考慮上的差異，中共與日本在「亞歐會議」（the Asia-Europe Meeting, ASEM）和「亞洲貨幣基金會」（the Asian Monetary Fund, AMF）的構想上卻與東協主義者同調，但在前者支持 EAEC 下後者卻反對。延續冷戰時代海陸爭霸的格局，海洋的東亞主義者仍較偏向亞太主義，而大陸的東亞主義者卻偏向東協主義；隨著兩韓的和解與反美情緒的滋長，以及南韓及中共間日益緊密的經貿關係，南韓似乎也將繼續強化其大陸東亞主義者的立場。

另外，在後冷戰時代，當東協國家積極尋求獨立自主，而主動參與亞太事務以提高其在亞太地區的發言份量時，中共與日本亦為爭取東亞盟主的地位，而積極拉攏或聯合東協；另一方面，東協因其安全戰略考量而與中、日、美保持平衡的關係，卻也因而使得東協得以在後冷戰亞太政經秩序重整的時刻扮演重要的角色。檢視東協對區域合作的發展過程，其所採取的策略是先在較不敏感的領域進行合作，再擴大到政治與安全層面，而東協之所以被譽為最成功的區域安全組織之一，則是在於東協各國運用各種策略，暫時擱置彼此的爭端以建立穩定的區域環境，同時促進內部團結以共同面對外在環境的衝擊。

此外，在全球區域化的情勢下，東協不斷強調其區域性的色彩，以增加其與北美及歐市相抗衡的籌碼。除在一九八九年加入亞太經濟合作會議外，馬來西亞總理馬哈地亦於一九九一年提倡東亞經濟集團（EAEG）的構想。同年十月，東協經濟部長會議中更通過泰國所提東協自由貿易區協定的構想，進一步推動區域內的經濟合作，以強化東協各國的經濟力量，並提升其在亞太經濟合作中的重要性。一九九二年一月，在新加坡舉行的第四次東協政府領袖會議是東協區域經濟合作發展進程的一個里程碑。此次領袖會議簽署了「新加坡宣言」、「經濟合作架構協定」和「共同有效優惠關稅協定」（CEPT）三項重要文件。會議的最重要收穫是，批准了一九九一年十月舉行的經濟部長會議所做出的關於在十五年內建立自由貿易區的建議。而上述三個重要文件中，最重要的是「共同有效優惠關稅協定」，它規定在未來十五年內把所有區域內貿易的工業製成品關稅減

至百分之五或零。會議還決定採取下列三項重要的組織措施，以促進區域經濟合作：一是，決定會後每隔三年舉行一次政府領袖會議；二是，由東協秘書處直接督導經濟活動與事務，解散原來由經濟部長會議領導的五個經濟委員會，以提高東協秘書處及其秘書長的職權；三是，成立一個由高級經濟官員、秘書處官員組成的經濟理事會，負責共同推動「共同有效優惠關稅協定」，而且會議還制定了明確的目標和具體實施的時間表。

另外，就區域層次而言，在經濟層面上，東協推動東亞經濟會議（EAEC）以凝聚亞洲勢力，排除西方國家對亞洲經濟的制約與掌控；在安全層面上，東協致力提升其在亞太區域安全體系中的主導地位，其主要作法是與非東協國家建立安全對話機制，如推動「東協區域論壇」（ARF）作為處理區域安全事務的重要機制、成立「亞太安全合作理事會」（CSCAP）作為補強 ARF 之第二軌道的外交對話管道。

然而，受到美國總統柯林頓上台後所揭櫫「新太平洋共同體」的強烈衝擊，東協部長會議於一九九三年七月將 EAEC 定位為 APEC 內部的核心會議。此舉雖對反美甚力的馬哈迪而言，不啻是一大挫敗，也象徵美日依全球主義所主導的 APEC，未來仍是亞太地區區域性經濟合作的最重要組織。但是換個角度來說，東協之所以會作出妥協的決議，必有其因應對策。事實上，東協已在一九九二年新加坡高峰會議中，決議將泰國所提之「東協自由貿易區」（AFTA）付諸實行，並預計自一九九四年一月一日起正式生效。因此，若將 EAEC 納入 APEC 正式體制中，東協可藉由挾 AFTA 以制 EAEC，進一步達到 EAEC 以制 APEC 之戰略目標。換言之，東協部長會議的決議雖表明 APEC 仍是未來亞太地區最重要的區域性經濟合作組織，但亦透露出在 APEC 架構下，東協國家與美澳等國所分別代表之「亞洲主義」與「亞太主義」間的折衝將愈形激烈（李文志，1997：117-118）。

其次，為凸顯東協對亞太事務的主導地位，並解決對外衝突，因此，東協主張成立東協區域論壇。對東協各國而言，ARF 的成立不僅象徵是以「東協方式」（the ASEAN way）維持亞太區域安全最具代表性的對話機制，亦更加凸顯其力求成為另一股區域勢力，以與美、日及中共強權並駕齊驅，共同決定亞太安全事務的企圖心。從安全戰略觀之，東協即是主張透過邀請非東協國家共商政經議題之擴大外長會議，進而掌握 ARF 的運作體系，主導多邊安全體系的發展方向。

另一方面，「東南亞十國」（SEA10）的構想，主要建基在東協若能結合中南半島國家，則在經濟上將可形成一個更廣大的市場與生產基地，而在政治上亦將可藉由東協的安全觀與東南亞集體意識的倡導，提升其在亞太甚至全球的發言地位。東協創始會員為印、泰、馬、新、菲等五國；一九八四年一月，汶萊脫離英國而獨立，成為東協第六個會員國。一九九四年五月，一群東協國家的意見領袖在馬尼拉發表「東南亞走向 2000 年的展望（A Statement of Vision for Southeast Asia Beyond the Year 2000）的聯合聲明；該聲明主張東協應積極推動泰國所提出之「東南亞十國」構想，而其最終目標是希望能使此一共同體不僅在東南亞區域事務上扮演重大角色，亦可以平等的地位與亞太區域強權互動（Hernandez, 1995: 27）。基於以上第二軌外交的努力，一九九五年七月二十九日，東協同意越南成為正式會員國；而在二十一世紀前將東南亞十國納入東協的構想，亦在同年十二月之第五屆東協高峰會中正式寫入「曼谷宣言」。針對 SEA10 之理想，東協首須解

決緬甸、寮國，及柬埔寨經濟發展程度、意識形態與原東協國家間的差距問題，而其中的緬甸甚至因其民主化問題、人權問題引發歐美國家嚴厲的批評。然而，一九九六年十一月第一屆東協非正式高峰會議中，東協仍排除眾議，基本上同意柬、寮、緬三國可同時加入東協，但時機待議（陳鴻瑜，1997：32）。經過一年的醞釀期，原訂在一九九七年七月二十四日的東協外長會議中可如願達成 SEA10，豈料同年七月上旬，柬埔寨發生武裝政變，情勢有所轉變，使得當次會議中僅有緬甸、寮國順利加入東協，而柬埔寨則在一九九八年方才加入，完成 SEA10 理想。

此外，東協為進一步奠定其主導東亞事務的地位，尤其是牽制美國在東亞地區的影響力，亦分別從「洲際平衡」與「大國平衡」兩條路線積極部署（李文志，1996a：71）。首先，其於一九九六年三月，主導亞洲十國（東協七國、日、中、南韓）與歐盟十五國的政府首長在泰國曼谷召開首屆「亞歐會議」。就其戰略意義而言，東協有意藉推動「拉歐入亞」之「洲際平衡」戰略設計達成其一舉四得的目標：抗衡中、日在東亞的勢力；制衡美國在亞太區域的影響力；拓展歐洲市場；透過東亞與歐洲經濟力量的銜接影響全球事務。而基本上，亞歐國家得以捐棄前嫌，召開二十五國的高峰會，其實是各有其戰略考量。就國際情勢來說，亞歐兩洲皆有意藉由「聯亞制美」或「聯歐制美」策略，企圖脫離美國霸權的陰影，形成世界經濟為亞洲、北美及歐洲三角鼎力的局面。

在「三個三角」的「中三角」戰略下，中共必須爭取亞洲 NICs 與東協國家加入其統一戰線。因此，一九九五年四月，中共首次同意與東協國家召開雙邊對話，即杭州會議，以消除中、菲美濟礁事件所引起的緊張關係。同年七月，在第二屆 ARF 中，中共亦針對南海問題對東協作出多項妥協，包括改變過去只與個別東協國家舉行「雙邊」會談的立場，同意與東協進行集體協商，不再堅持過去片面處理南海問題的方式，宣稱將依照國際法、聯合國海洋公約，及相關法律規定，妥善解決南海問題，願意維護南海地區航道的暢通與安全，但應排除美、日等非南海地區的國家介入南海主權爭議。中共選在東協亟欲提升 ARF 在亞太安全體系中所扮演的角色之際，提出符合東協立場和排除美日介入南海爭議的主張，顯然是為建立其與東協「中三角」的統一戰線，進而在地緣上拉開足夠的縱深，以利其經營「大三角」的戰略（李文志，1997：251-255）。此外，在東亞金融風暴之後，中共亦先後以宣佈人民幣不貶值、提供經援及呼籲形成自由貿易區等（吳德鳳，2000：160-172；中國時報，2000.11.26），刻意強化與東協國家間的關係。

另一方面，日本為加強與東亞國家的關係，自一九九一年一月起，海部首相先後訪問南韓、東協諸國以及中國大陸。其中，在訪問東協時，海部強調俟柬埔寨問題解決後，日本將發起有關中南半島的復興計畫，明確地向東協各國傳達其欲承擔東南亞各國最感棘手的問題。同年七月，東協舉行擴大外長會議（ASEAN-Post Ministerial Conference, ASEAN-PMC）時，日本外相一改以往保守的亞太政策路線，積極鼓吹將原來侷限於經濟層面的 ASEAN - PMC 擴大至政治與安全層面的對話，表明日本亟欲藉機拉攏東協來提升其國際地位（李文志，1997：240-241）。

一九九二年十月，宮澤首相訪美時，即正式表示希望美日共同推動亞太區域多邊安全架構，以防亞太地區因權力真空引發區域安全的威脅。一九九三年一月，宮澤訪問東

協國家時，則進一步在曼谷發表「宮澤主義」；此堪稱日本後冷戰時代的新亞太—東南亞政策。其主要內容為：日本將和東亞各國共同建立一個亞洲區域安全體系；日本並沒有重建軍備的意願，更不會走向軍國主義的道路；在經濟上促成建立自由貿易體制，共同援助東南亞的未開發國家；在美軍撤離菲律賓與中南半島後，日本將更增進和東南亞國家相互依存的關係，力圖消除東南亞各國對日本的疑懼（FEER, 1993: 10-11）。一九九六年後，美日安保的續約、防衛指針的修訂，及 TMD 的參加，更表示日本的安全政策，基本上仍在銜接美國的亞太主義。

肆、台灣的角色

因應後冷戰時代國際政經潮流的變遷，東亞地區出現三種區域主義；其中，當每一種區域主義都企圖聯結或將台灣納入之際，台灣卻因政治孤立而致使本質上不屬於任何特定區域主義的情況下，正須全面性的重新評估、定位，才能決定因應之道。

東亞區域主義在經濟合作與安全諮商上顯然存在著不同的特質。從安全部署上看，中共的「三個三角」戰略與美日新安保體系的建構，似乎又將東亞地區一分为二，體現東亞地區海陸爭霸的基本格局；小布希政府上台後所表現對於中共的強勢作風，似乎更會強化此基本格局。在此其中，東協主義所聯結各方參與的 ARF 和 CSCAP，似乎就扮演著緩衝、平衡和中介性的安全瓣。在面對中共的威脅下，台灣的選擇似乎只有加入美日合作的亞太主義，同時謀取親近東協主義者的機會。當然，對於台灣是否加入 TMD 的問題，本質上仍屬負擔成本上的考慮。

其次，對於經濟合作層次而言，東協主義與中共的東亞主義對於亞太主義的抗拒，仍屬南北對峙傳統中因經濟發展階段的差異所引起。展望未來，東協區域內的自由貿易區固然會有其作用，但是就像過去「南南」之間的經濟關係是「競爭甚於合作」一樣，也必然會有其限制，尤其隨著一九九七年金融危機的發生、區域內經濟發展朝向垂直與水平整合的複合式發展趨勢，和美國依科技能力而恢復的競爭優勢等，亞太主義似乎又將凌駕東協主義與東亞主義。鑑於東協主義與亞太主義間的落差，以及台灣地緣經濟上的特色，適度的追求或支持介於兩者間的東亞主義，例如支持 AMF 構想，對於台灣而言，亦將有其空間。

多年來，從亞太營運中心到全球運籌中心，台灣一直試圖在後冷戰時代的亞太政經趨勢中定出全方位的國家發展戰略。整體而言，台灣的亞太戰略，除考量地緣政治的特質外，還須考慮技術、市場與資本等因素。基本上，我們似乎仍須以高科技和資訊科技為主的產業政策，一方面支撐國內傳統產業的發展，另一方面則進而建構以科技產業為主的亞太研發及營運中心，以架構台灣與美、日等強調亞太主義的海洋國家間之科技產業關係，及台灣與中共、東協國家等強調東亞主義與東協主義者間的研發與製造上之分工關係。兩岸關係中所涉及「戒急用忍」和「大三通」等政策調整，顯然也必須放在兼顧國家安全和產業分工的架構脈絡中進行。

台灣至一九九八年底前，根據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的統計，實際對外投資額為 117,401 百萬美元；其中 80,434 百萬美元分布在亞洲，而 41,279 百萬美元在中國大陸。投資所到之處，即是台商遍佈的範圍。加上東亞金融風暴後東協國家對於華商待遇的改善和對台商的禮遇，台灣事實上可以善用華商與台商網絡，有效推動其對外經濟政策，並適時拉近與東協主義者間的關係。其次，東協國家中眾多的留台學生及積極參與當地事務的華商與台商組織，也是台灣一項重要的人力資源與人脈資產。

參考書目

一、中文部分

- 中國時報。1993。一九九三年十一月十五日，第九版。
- 中國時報。2000。二〇〇〇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第三版。
- 李文志。1996a。〈後冷戰時代亞太安全體系發展與台灣戰略的思考〉。收錄於蕭全政等著《劇變中的亞太與兩岸關係》，頁二九至九。台北：業強出版社。
- 李文志。1996b。〈中共的亞太戰略：海洋戰略的開展與挑戰〉。收錄於蕭全政等著《劇變中的亞太與兩岸關係》，頁九一至一五三。台北：業強出版社。
- 李文志。1997。《後冷戰時代美國的亞太戰略——從扇形戰略到新太平洋共同體》。台北：憬藝出版社。
- 周添城。1993。〈亞太地區經濟整合之展望〉。收錄於後冷戰時期亞太戰略情勢展望研討會論文集，頁二二六至二六八。三軍大學戰爭學院兵學研究所、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主辦。
- 吳德鳳。2000。《東亞金融危機對亞太區域安全影響之政治經濟分析》。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研究所碩士論文。
- 許介麟、李文志、蕭全政。1991。《台灣的亞太戰略》。台北：業強出版社。
- 張雅君。1998。〈中共與美、日的亞太海權競爭：潛在衝突與制度性競爭機制〉，中國大陸研究，第四一卷，第五期，頁五至一九。
- 陳治萍。1993。《東協國家的區域性政經發展》。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陳鴻瑜。1997。《東南亞國家協會之發展》。埔里：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出版。
- 陳鴻瑜。1992。《東南亞各國的政府與外交政策》。台北：渤海堂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蕭全政。1993。大陸經濟改革與兩岸關係關係之演變：台灣的挑戰與機會。中華經濟研究院主辦，「大陸經改前景與兩岸關係」研討會，一九九三年三月二至三日，台北。
- 蕭全政。1995。〈後冷戰時代的兩岸關係〉，理論與政策，第十卷，第一期，頁四九至五九。
- 蕭全政等。1994。《亞太經濟合作與台灣角色之研究》。台北：行政院研究考核委員會。
- 蕭全政等。1996。《劇變中的亞太與兩岸關係》。台北：業強出版社。

二、英文部分

- Baker, James, III. 1991. "America in Asia: Emerging Architecture for a Pacific Community." *Foreign Affairs*, Vol. 70, No. 5 (Winter 1991/92), pp.1-18.
- Bowles, Paul. 1997. "ASEAN, AFTA and the New Regionalism," *Pacific Affairs*, Vol.70, No.2: 219-233.
- Brown, Eugene. 1993. "The Debate over Japan's Strategic Future." *Asian Survey*, Vol. 32, No. 6: 543-559.
- Brown, Eugene. 1994. "Japan's Security Policy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Asian Survey*, Vol. 36, No. 5: 430-446.
- Dijwandono, J. Soedjati. 1988. "The Role of ASEAN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in Kim Dalchong and Noordin Sopiee. Eds.,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the Pacific Era*. Seoul: Institute of East and West Studies, Yonsei University.
- Dosch, Jorn and Manfred Mols, 1998. "Thirty Years of ASEAN : achievements and challenges." *The Pacific Review*, Vol.11, No.2: 167-182.
- FEER. 1993. "Japan's Clarion Call,"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Jan. 28, pp. 10.
- Funston, John. 1998. "ASEAN : Out of Its Depth ?"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20, No.1 : 22-37.
- Garofano, John. 1999. "Flexibility or Irrelevance; Ways Forward for the ARF"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 21, No.1: 74-94.
- Gilpin, Robert. 1994.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Jersey: Th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Hernandez, Carolina. 1995. "ASEAN Strategy" in 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sia-Pacific Collective Security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April 12-14. Held by the Institute for National Policy Research and the International School on Disarmament and Research on Conflicts. Taipei.
- Portes, Richard and David Vines. 1998. "European integration: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in Peter Drysdale and David Vines, eds., *Europe, EastAsia and APEC: A Shared Global Agenda?* United Kingdom: Th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h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ism in East Asia and the Role of Taiwan

Chyuan-Jenq Shiau*

Abstract

From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this article tries to analyze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ree sorts of regionalism in East Asia. Any regionalism obviously entails specific patterns of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among the related countries, and thus different interest to all of them. These countries collude and collide from one another accordingly when the regionalism forms, operates, and changes.

In order to upgrade political autonomy and accelerat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ASEAN nations as a whole, Aseanism was originated in the presence of the East-West confrontation in the Cold-war era, and expanded when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security consultation had been emphasized in the age of the Post Cold-war. Furthermore, while the U.S. and some other advanced countries attempted to promote an Asia-Pacificism to rearrange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der in East Asia after the phase-out of the Cold-war, China and Japan respectively endorsed different versions of East-Asianism when they each had distinct strategic interests and considerations. The development of these sorts of regionalism had been conditioned by the hegemonic struggle between the continental world and the maritime world of the region in the Cold-war era; this impact seems to have still been there when the struggle obviously continues.

Key Words: Regionalism. 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 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 ASEAN Regional Forum (ARF). Asia-Pacificism. East-Asianism. Aseanism.

*Professor in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